



PIONEER

现代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传奇故事
四位中华民族最优秀女性的磨砺之路
历史档案，独家披露 珍贵照片，首次面世

先锋

翟晓光◎编著

新中国大使夫人传奇

先鋒

崔晓光◎编著

★ 新中国大使夫人传奇

 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先锋:新中国大使夫人传奇/翟晓光编著.-北京:金城出版社,2010.1
ISBN 978-7-80251-294-8

I. ①先… II. ①翟… III. ①大使-亲属-生平事迹-中国-现代
IV. ①K828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18188号

先锋——新中国大使夫人传奇

编 著 翟晓光
责任编辑 雷燕青
文字编辑 林冬梅
封面题字 何水法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印 张 12
字 数 145千
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书 号 ISBN 978-7-80251-294-8
定 价 29.80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
邮编 100013
发行部 (010) 84254364
编辑部 (010) 84250838
总编室 (010) 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

这是一卷珍贵的历史档案，绝大多数照片都是第一次面世。

它提供的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传奇之一——中国女性解放的故事。在这条漫长的血与火、情与仇交织的道路上，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披荆斩棘一路走来，是这条道路上的开路先锋。也许大辩无言，也许大音希声，多少年天地翻覆，多少次花开又花落，她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讲述自己。在她们身上，有着当代人最为稀缺的美德，那就是母亲般的平易与谦逊。无论做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业，哗众取宠对这代人而言就是卑劣，标榜自我和宣传个人为她们所不齿，因为她们是相信“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”的革命者。

在所谓“口述史”流行的今天，本书不愿也不能披上“Oral History”的学术外衣。因为作为倾听者和记录者，我从来不想隐瞒自己的立场。在我看来，对于那些借口述史来宣扬革命给女性造成伤害的“女权主义”者来说，她们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：对于现代中国女性解放运动、对于中国革命的“旁观者”立场。正是这种小资产阶级的“旁观者”立场，使他们不能认识到一个简单的事实：如果没有政治的平等与解放，女性的权利就不知从何谈起，而追求政治权利的平等，就是中国革命的根本目标。

要奋斗就有牺牲。从1931年中华苏维埃政府公布第一部宪法申诉女性的政治权利以来，为了实现这些权利，正如本书所揭示的，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一代女性付出了巨大的鲜血和生命的代价。

本书的立场毋宁是斗争性的，因为今天某些人力图刻意制造一种叙述，去抹煞和否定中国妇女革命和女性解放的历史。这些叙述的制造者既有存心不良的男人，也有自以为摩登的女人。一个民族不能以“无知者无畏”为时尚，何况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。
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本书所提供的“讲述”，对每一个倾听者而言，既是一个可以在当下安身立命、堂堂正正做一个“女人”的宝贵遗产，也是对未来世界的展望。因为这些普通而又伟大的母亲，既与历史上的花木兰一脉相承，也依旧是未来女性解放道路上的先锋。

正如逝去的诗人骆一禾的一首诗所写的：

世界说需要燃烧
他燃烧着
像导火的绒绳
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
当然不会有
凤凰的再生……

在春天到来的时候
他就是长空下
最后一场雪……
明日里
就有那大树的常青
母亲般夏日的雨声

我们一定要安详地
对心爱的谈起爱
我们一定要从容地
向光荣者说到光荣

目录

- 木兰辞·····朱 霖 1
- 从边城走向世界·····赵兰香 55
- 传奇·····朱黎清 93
- 琳琅锦绣·····刘锦琳 139

木兰辞

朱霖



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子，是党和人民教育我走上为人民、为民族求解放的道路。我中学时代的一个女共产党人告诉我说，要少想自己，多看看国家和社会。我希望我的一生是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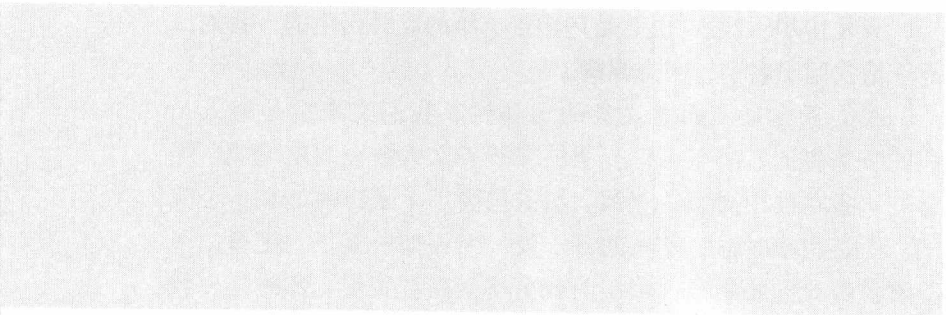
朱霖，原名文佩卿，1920年2月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司马村一个农民家庭。

1937年参加太行山地区抗日游击斗争。1938年，18岁的朱霖在抗日游击队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9年秋，在晋冀豫解放区党代会上，作为党代表的朱霖与时任晋冀豫军区政委、区党委军事部长的黄镇邂逅并结为伉俪。

1941年6月，朱霖由太行二区地委党校教务主任，调八路军129师组织部干部科担任营级干事，参加了包括百团大战、十字岭战役等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，经历了太行山斗争全部的艰苦岁月。

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，朱霖被提拔为正团级干部，荣立二等功。1948年，从太行山区调入河北平山县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，并参与筹备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。1949年3月，随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入北京。

1951年1月，奉命由总政干部部调入外交部工作，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首任大使夫人，并主管大使馆党务工作。



1954年11月，担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夫人和二等秘书，亲自参与了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的保卫工作，并陪同周恩来总理参加了会议期间的主要外交活动。

1961年5月至1964年6月，担任外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外组组长。

1964年5月，担任首任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夫人，一等秘书。

1973年5月，和黄镇主任一起赴美国首都华盛顿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联络处。

1977年回国后，担任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、纪委副书记兼国内部部长。

1978年，在全国妇女第4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常委，1983年，被选举为全国妇女第5次代表大会中直和国务院代表团团长。

1982年9月30日离休。

我是1920年2月，也就是1919年羊年的腊月出生的，我的二爷爷给我起了名字，叫文佩卿。

我的老家是山西孝义县的司马村。我们文家也是穷人，我的爷爷耕地，早年去世。我的二爷爷文天龄在北京琉璃厂当学徒，省吃俭用攒了一点钱，给家里买了十来亩薄地和半个院子。但是我小时候，家里的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了。记得三爷爷常拉着我到处借钱，到年关就得更得借高利贷了。那时候，我家一年四季吃两顿饭，早饭总是米汤、料窝子，就是用牲口料黑豆、高粱磨成粗粒子，蒸出来是又红又黑。除了过年，我们从来没吃过好饭。

我从小感情脆弱，胆子很小，长大连鸡狗都不敢摸一下。我7岁上学，既不聪明，也不伶俐，学习成绩差，常被打手心。家中也无人帮助我。在北京的二爷爷三年回来两次，他给我讲历史上的花木兰，讲我们家是宋朝文潞公的后代，有时他拍着我的脑袋连连叹息，说：“可惜你是个女孩子！”这给了我很大的刺激。

我们家在司马村还不是最穷的，而我外婆家则可以说生活在最底层。外祖父过世后，全靠外祖母养家，基本上吃了上顿没下顿。我的母亲14岁嫁到文家，18岁生我，又遇难产，再未生养。父亲在北京学徒的时候沾染上抽大烟的恶习，几乎不顾家。母亲经常以泪洗面，哭着对我说：“你可要给我争口气啊！”我那时候很小，就对她说：“妈，你不要怕，以后我养活你！”

我的二奶奶、妈妈、二婶都是非常善良的妇女，她们做在人前，吃在人后，与世无争。

我的二姨嫁的是个破落户，跟着丈夫住马厩。为了养活丈夫和女儿，二姨到汾阳和太原去当了妓女，40岁时患脑溢血去世了。二姨的女儿也很不幸，二姨死了以后，她和姨夫生活更艰难，待到父亲去世，她把父亲埋葬后，就吊死在马厩门前，她只比我小一岁。

三姨13岁那年被卖给文水县城南村一个38岁的男人做妻，受尽了虐待，自杀了四次，上吊、吃砒霜、吃烟土、钻水缸，都被救活了，死都死不成。三姨是我陪送她到文水出嫁的，那

时她才13岁。

四姨比我小一岁，被送到汾阳城学山西中路梆子。抗战前好不容易要出师了，她却被教练活活踢死在舞台上。

我母亲的姐妹们命运就是这么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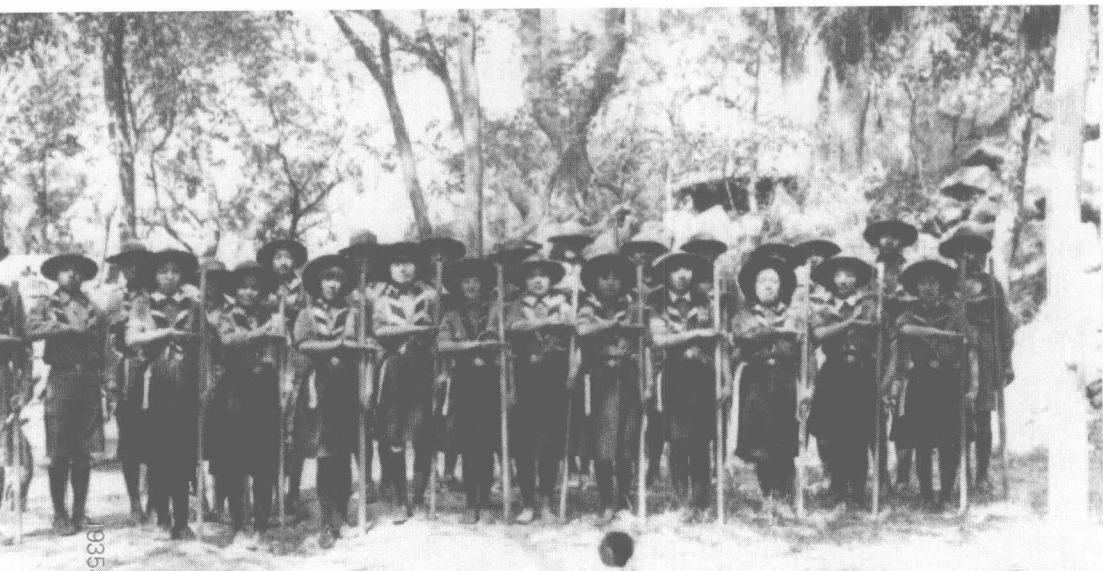
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因为分家另过，搬到汾阳城。父亲给人家跑腿，母亲为工厂工人洗衣服拆被子，家里刚好了一点儿，没想到房东的儿子对母亲起了歹意，调戏不成，就找人把我父亲抓进牢房里。那个家伙在模范监狱当书记。父亲被抓走了，母亲哭个不停。我去看守所给父亲送饭，看到满地躺的都是人。三爷爷随我们过，他经常对我说，这个汾阳城就这么可怕啊！

为了一家人的生活，我只好停学，跟邻居到工厂砸核桃。一个穷人家的女孩子是谁都可以欺负的，只能这么忍着，从天不亮到黑天，只能挣一两毛钱。就这样，三爷爷和妈妈还是很高兴的，一毛钱可以买二三斤小米或高粱面。等父亲从看守所被放出来，我已经停学一年了。复学后，我的心理压力很大，跟不上学习，只好留级一年。这个时候我真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思，还不如死了，至少可以少受罪。像我这样的小孩子就有了自杀的念头。

我上高小期间，已经有媒人来提亲，让我嫁一个下肢瘫痪的富家子弟，这样一辈子就可以不愁吃穿了。我对父母说，你们要是答应，我马上死在你们面前。他们就我这么一个女儿，也就没有答应。我们那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：“十三留头十四嫁，十五养个胖娃娃。”穷人家的闺女真是没办法啊！

1935年，我15岁，高小刚毕业。我当时想如果能进初中三年，毕业后就能穿白大褂当个护士养家。当时我的三叔文广华在太谷铭贤中学教书，我就写信求他，他答应了。临走，母亲从旧货摊子上买了两片黄夹帘子做成被子，父亲拿出在北京穿过的绸夹袍，母亲把它染了一下，给我做成棉旗袍，又将她结婚时穿的三尺半上衣，给我改成单旗袍。我一个人坐火车去太谷，一路上就怕丢掉了行李。

太谷铭贤中学是美国奥柏林大学基金会创建的。经过三叔的申请，学校免了我一年的学费100元。我只能住在三叔家里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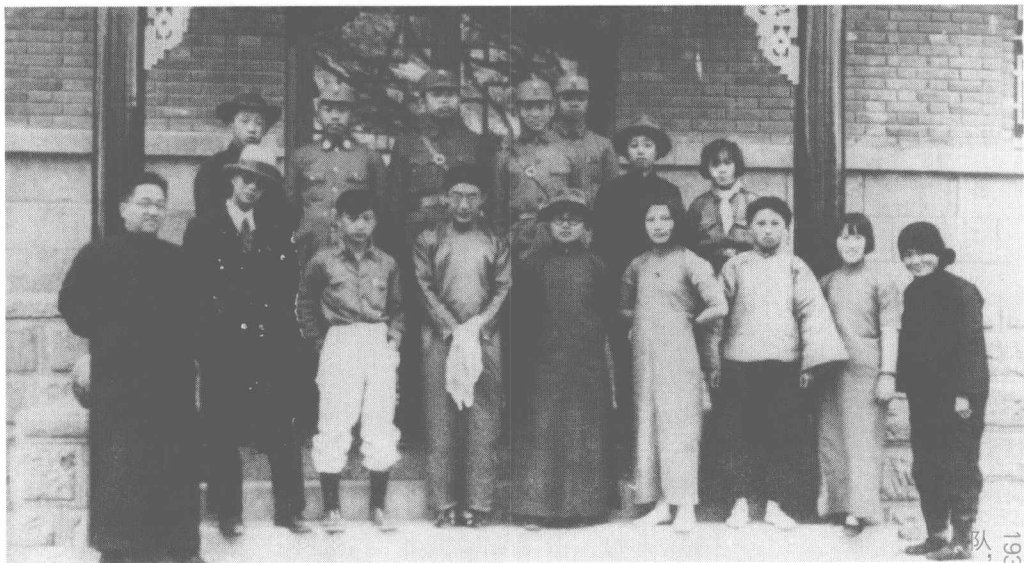
1936年，朱霖（前排右三）参加铭贤中学成立的童子军。

这样省了食宿费。三叔每月的薪水只有30元，一家三口加上我，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。为了少看三婶的脸色，我就努力多干活，学习压力又大，经常晕倒在地上。三叔怕我得干血癆，带我到医院。人家给了50粒维他命保命，我自己舍不得吃，捐给了乡下的二奶奶。

在我最痛苦的时候，有个人救助了我，她就是学校女生部主任徐焕之老师。她的爱人是共产党人，牺牲了。徐老师在初中女生住的红楼里给我找了间耳房，不收房费，离三叔家也近。她告诉我说，你不要老想自己，应该抬头看看国家和社会。

住进学校后，我休息的时间多了，接触同学的时间也多了，还有了看课外书的机会。我最初看的是巴金的《家》，一边看一边哭。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接触了进步思想，像绝望的落水之人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一样。

这个时候北平一二九运动波及我们学校。我的音乐老师王文辅是冀东人，他在课上讲亡国奴的痛苦，师生一起痛哭流涕。我那个时候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队，而且还登台演话剧。



1937年，朱霖（前排右二）参加铭贤中学抗日救亡宣传队，登台表演话剧，演出后，全体演员合影。

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我从一个愁眉不展的女孩子，变成了一个活跃的人，学习成绩也好起来了。

1937年，我三叔被学校解聘了，我只能回家想办法筹措学费。此时，二爷爷已经落魄地从北京回老家了，他给了我10块钱。我去看了我的外祖母，她衣衫褴褛，头上的虱子乱爬，背驼着，腿弯着，正在用麦秸烧火做饭。这幅模样让我心如刀绞。她的孩子没有一个能养她，而且各个命运都那么惨，我只能边哭边说：“外婆，我以后养活你！外婆，我以后养活你！”我就这么一跺脚哭着走了。

就这么一跺脚离开了我的家，从此一去12年。

没有钱，学是不能再上了，也正赶上日本侵占山西，学校要搬到大后方。我那个时候经同学石玉瑛介绍已经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。当时我决定不走，要走就跟着“民先”走。当时“民先”要组织抗日游击队，我就和学校的50名同学留下来，到太行山，去打游击。

我就是在这种几近国破家亡的时候参加革命的。

那个时候我们的组织领导有杜润生，他建国后成了我党内

的经济专家和农村问题专家，是个大知识分子。其他的还有八路军129师派来的老红军蒋克诚、秦基伟等。在这个大家庭里不但吃饭不要钱，还有那么多大哥哥大姐姐们照顾，我头一次感到非常充实、幸福。

打游击是非常艰苦的。我刚刚参加革命不久，也就是在1937年11月，队伍到达榆社县城北的峡口村的时候，我们远远看到一个老农从北边缓缓步行而来，同志们说，那就是朱德总司令。朱总司令进太行山了，后面随行的还有大作家丁玲同志。见面后同志们欢呼起来，要总司令讲话。

我1938年在游击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当时全国的党员最多也不过三五万人。我感到自己得到了新生，真正的生命开始了。

1938年初，榆次地委调我去太行山区党委党校学习，党校由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同志和委员们领导并亲自讲课。到了党校，因战争的形势非常复杂，所以要求大家都改名字。我愿意和朱总司令姓一个姓，希望普降红色及时雨，于是改名为朱霖。这就是我今天的名字。

1939年春天，当时我19岁，从党校毕业后回二地委党校任教务主任。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遇到了黄镇。当时石玉瑛同志要给我介绍爱人，我表示反对还同她吵了起来。有一天，晋冀豫军区在我们党校开会，军区请我作会议记录(笑——我当时警惕性不高)。我发现坐在台上的一个人总在看我，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是黄镇。黄镇留给我的印象是很帅气的。在会议休息时，他去看我作的会议记录，我也没有太上心。我一开始不太同意，黄镇托石玉瑛给我捎来一支自来水笔和一个笔记本，当时一支钢笔就是奢侈品。我觉得他是在用东西引诱我，很生气，把它扔了，但石玉瑛悄悄收起来没有退回。从此他就自己来找我谈，也不断来信，我们才相互了解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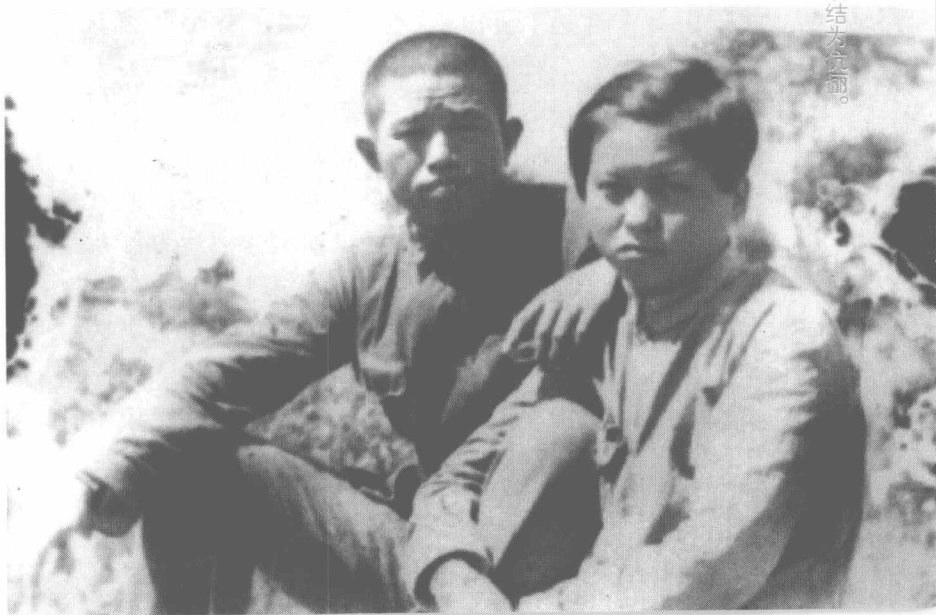
1939年秋，区委召开党代会，我是代表，他是晋冀豫军区政委，也是晋冀豫党委军事部长，我们碰到一起，他提出结婚。我明确提出我的顾虑：一、他是高干，我信不过，怕被玩弄；二、我要坚持工作，决不当首老婆；三、不愿生孩子，怕妨碍工作。黄镇当即表示接受。黄镇当时有两句话，打动了

我。他对我讲：“我一定以无产阶级之道德、共产党员之品质来对待你。”50年的历史表明，他对我提出的第一、二条真是说到做到，只是第三条未能实现。

当时解放区还没有结婚登记仪式，经组织批准，组织部长与双方谈话就行了。我们是在区党代会期间结婚的，除参加会议的领导外，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杨尚昆、李伯钊、康克清等同志也来祝贺。康克清同志一来就问黄镇他的迫击炮是哪一个——当时长征的时候，人们常开玩笑说：男的叫“机关枪”，女的叫“迫击炮”。

1940年夏天，百团大战前，急性赤痢流行，已在死人。那时我在区党委党校工作，参加春耕检查工作后，被传染了赤痢，每天还拄着棍子去讲课。雪峰同志知道了，马上让校医老红军罗医生给我治疗，他把长征时带来的德国阿米丁给我打了，要不是这一针，我恐怕早已经不在人世了。痢疾虽然好转了，但却变成了慢性，这么一拖就是9年。

1941年6月，我调到129师组织部担任干部科营级干事。当时女同志在野战部队是非常困难的。在一次女同志的座谈会上，有人发言说，敌人扫荡这么频繁，女同志在部队会成为拖累。还有人说，在反扫荡的时候，一个女同志骑在马上，一个老红军就指着她的背说，老子身上有许多窟窿，还骑不上马，



1939年9月，朱霖与时任晋冀豫军区政委兼军事部长的黄镇结为伉俪。

你身上有一个窟窿，却能骑大马。我虽未骑过黄镇的马，但听了非常难堪。我下定决心：我是女同志，是来革命的，绝不会输给男同志。

当时黄镇是政治部副主任，他让我住在组织部，避免同进同出，因为当时结婚的人很少，必须注意影响，我见他一面，也跟做贼似的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日寇加紧了对太行山区的扫荡。1941年秋季大扫荡的时候，为了迷惑敌人，总是在敌人离我们驻地非常近的时候，领导才下令转移。当时我已经怀孕三个月了，背着背包和部队跑步过漳河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战场上最怕的就是掉队，一个女兵如果掉队是个什么结果那是不言而喻的。拼命跑啊，上下山时，我有意跳沟、蹦脚，只感到肚子疼，肚子里的孩子却纹丝不动，这个包袱怎么也甩不掉。

1942年2月春季反扫荡，为了机关能迅速转移，领导决定让将要临产的刘伯承夫人汪荣华、我、另外两个女同志四个大肚子单独去打游击，只给了两个手榴弹，由产科医生马芳晓同志和一位文化干事带路。我们就在敌人堆里穿行，怀着身孕一夜能跑50多里路。

临产前最后一夜，我们从山上下到一个敌人刚刚烧抢过的小村——涉县的林旺村。被烧的房子还在冒烟，好不容易找到两间小房，其他三个同志住进去，我只好住在驴圈里。我和马医生赶紧清除驴粪，把驴吃草的木槽清出来准备放孩子，马医生边干边开玩笑说：“朱霖，你要成马丽亚了。”

我们四个人都顺利分娩，当时汪荣华同志拿出刘师长给他的一个月津贴，一共5块钱，黄镇托人送来了两只鸡，我们就靠这些东西坐了月子。

产后我总是伤心落泪，马医生问我原因，我说我就是不愿生孩子，怕妨碍工作，我是来革命的啊！我要求她快帮我处理孩子，结果就在我生产后的第七天，马医生骑了一头毛驴，把我的女儿裹在棉袄里，沿途向老百姓讨奶吃。回到政治部驻地王堡，才在温村找到一个奶妈，交给人家抚养。黄镇当时在三分区指挥作战，敌人的一发炮弹打中了跟他在一起的郭国言司令员，他却没有受伤。他回来就抱了一下孩子，说很好。其实孩

1953年2月，刚刚做了母亲的朱霖和大女儿二乖。在战争年代，黄镇一直把这张照片珍藏在皮靴的夹层里。

